

中国经济国际化成为经济全球化主要变量

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加剧了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动,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引擎。本文通过总结中国经济国际化跨世纪的阶段性特征,认为本轮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我国经济的国际化出现了明显的历史性的转折,中国经济的国际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变量。

◎常清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逐步地经济国际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进入本世纪,我国的经济国际化发生了一些历史性的显著变化,本轮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我国的经济国际化出现了明显的历史性的转折,即,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剧变,新经济格局的逐渐形成,经济全球化进入了以中国经济国际化为主要变量的时代。本文从我国经济国际化的不同阶段的特征入手,剖析其背后世界经济格局剧变的根源来认识我国经济国际化的历史性转折。

中国经济国际化跨世纪的特征

经济国际化本质上体现了一国主动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利用市场的能力。发达国家的经济国际化带动了经济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中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也在逐步经济国际化。经济国际化先驱的历史表明,一国的经济国际化是以要素禀赋条件的变动为前提,以知识、技术为核心,以政府支持为保障,以跨国公司为载体,需要经历由发挥比较优势到创造竞争优势的开放战略转移,从贸易大国向投资大国的阶段化迈进,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提升经济全球化程度。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积累,中国的经济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从实证分析来看,我国的经济国际化近几年来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出现了一些非常显著的新特点,我们将经济国际化两个阶段的特征进行概括比较,可以看出,我国的经济国际化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历史性转变。

回顾对外开放三十年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从对外开放初期到加入WTO之前,我国在经济国际化的浪潮中处于明显的边缘化弱势地位;虽然我们采取了积极主动地开放策略,但从全球经济国际化的角度看,仍处于被经济国际化的状态;在经济国际化的浪潮中参与分工,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也付出了一定的成本。

首先,在经济国际化潮流中处于被国际化的地位。在政策选择上,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主动的,从要素禀赋结构来看,则是被动的。经历了十年浩劫,国内现代化建设急需资金、物质、技术和人才,外汇成为当时的“稀缺资源”。为了出口换汇,中国通过节能,将一部分石油、煤炭等资源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出售,1980、1981两年外汇金额相当于出口总额的18%。对外开放初期,利用外资的形式也以国际信贷为主,1979年以来,我国共对外签订技术引进合同近8万项,合同总金额2000多亿美元。其中,“十五”期间,签订技术引进合同3.5万项,合同金额近730亿美元,占改革开放以来引进技术总额的36%。中国需要靠引进资本、引进技术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要素禀赋的限制决定了中国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弱势地位,中国只是发达国家资

本、技术溢出的接受者和廉价的资源供应者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承接者,中国处于被经济国际化的状态。其次,在经济国际化潮流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从国际分工的地位来看,中国在规则制定和利益分配上被边缘化。对外开放初期,中国引资额度有限,以出口资源性产品为主,1980年,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占到72%。1980年代承接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以及1990年代抓住国际产业结构调整 and 转移的机遇,促成机电产品发展和出口,大多以“三来一补”为主,集中于服装、家具、轻工产品等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的行业。根据微笑曲线理论,我国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低端,在国际分工中地位不高,徘徊在利润分配的边缘。最为明显的是,中国长期被排斥在多边贸易体系之外,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没有话语权,无论是利用规则还是制定规则,中国都是一个被边缘化的国家。加入WTO之后,中国虽然有了“谈判”的资格,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度权仍然由少数发达国家把持着,他们极力维护和强化“核心”与“边缘”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国到底还是被“规则”的国家。经济全球化的内在本质就是,在宏观层面,游戏规则由发达国家制定,在微观层面,产品标准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制定。中国在经济国际化潮流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再有,在经济国际化受益的同时也付出了一定的成本。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国引入技术资金使得我国的加工工业发展壮大,成为世界的加工制造中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成本。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引进外资数量为业绩,过度给予外商优惠措施,导致大量土地浪费,投资密度不高,税收减免过多,甚至出现环保标准降低的情况。可以说,中国为这一轮的经济国际化透支了资源、透支了环境、透支了财政收入和劳动保障……透支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健康,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济与社会失衡。

其一,20年来出口退税额年均增长33%,挤占了公共财政用于社会保障和福利的空间。2005年已经高达3371亿元,占国家税收总收入的11%,逼近2001-2005年)国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年平均份额(1%左右),远高于同期税收增长水平。而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其二,低水平的技术消化吸收,浪费了资金。以1998年为例,我国引进技术共6254项,其中被消化吸收的仅为3项;引进技术合同金额共计164亿美元,而消化吸收合同金额只有1293.23万美元,分别占0.0488%和0.0729%,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创新与发展。

从本世纪初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以来,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非常明显地出现了新的特征。这些特征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一个阶段的结束,新经济国际化阶段的开始。首先,我国开始主动地在世界范

围内合理配置资源,表现为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输出管理和技术。

对外开放30年,中国稀缺的不再是资本(包括外汇、设备)和技术,如今,中国积累了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已经成为世界上拥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2006年,中国国内投资中的FDI份额已经由1995年的13.3%下降到5.3%(见表),中国已经告别了盲目引资的时代,中国继续发挥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方面具有的比较优势,同时有选择的承接高新技术制造业的生产环节向国内转移。

对外直接投资正在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生产要素全球化配置越来越重要的方式。2002-2006年之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60%。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全球国家中排名第13位,占国内投资的比重由1980年的几乎空白上升到1.53%,FDI流出存量达到FDI流入存量的30%。联合国贸发组织公布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FDI来源地。中国现在虽然还不是对外投资的大国,投资额在全球占比不到1%,但是潜力巨大。

中国人均GDP正在向3000美元迈进,开始走向技术自主创新之路。自1995年以来,中国在技术研发方面的资金投入力度每年都在以平均19%的速度增长,科技创新综合指标已相当于国际人均GDP5000到6000美元国家的水平,科技创新产出增长率位居世界前列。2007年中国列金砖四国创新指数第一,优势在于创新资源能力,创新攻关能力,创新技术实现能力以及创新价值实现能力,加大创新型和激发攻关能力推动了中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未来中国将成为技术输出大国。

其次,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发生了改变,由边缘化转变为世界经济规则制定的参与者,为经济的国际化构建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在加入WTO之前,亚太经合组织(APEC)是中国唯一参加的国际经济组织,加入WTO之后,中国开始参与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活跃在世界经济的舞台。2006年7月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名为《G7的进化与对政策协调》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对于全球经济体系的影响力是巨大而不可否认的,首次提议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BRICS加入G7。2006年,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投票权由2.98%提高至3.72%,排名由第八位升至第六位,虽然只是微调,但增加中国投票权,反应了IMF的自我调整和完善顺应了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动。中国已经成为任何国家和组织不可忽视的力量。

再次,中国正在走出有自己特色的经济国际化道路,这一特色初步可以概括为:平等互利,多赢同发。

中国的经济国际化是一个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互利多赢的经济国际化,中国在全球整合资源日益得到众多东道国的认可。构建互利共赢的开放格局,是中国国际化的基本战略。当前,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开发被指为“新殖民主义”,自“中非合作论坛”召开以来,2008年双边贸易额较去年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人文领域交流蓬勃开展,文化、教育、青年、旅游、民间往来日益频繁。据有关国际机构提供的数据,在2006年非洲的全部石油出口中,出口到中国的只占8.7%,而出

口到美国和欧洲的分别占到了33%和36%,中国从非洲进口的原油份额是相当低的。中国不是“殖民主义”,中国的投资对加快非洲的工业化进程举足轻重,同时,中国在南美及中亚、东盟的经济合作也得到东道国的认可。中国通过自身开放的经验和教训,力图以科学发展观参与全球分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将更注重对方的可持续发展。

世界经济格局的剧变是我国经济国际化转折的根本原因

考察世界经济历史,几百年来,各大国在一轮轮的经济国际化潮流中此起彼伏,美国、日本、新兴工业国等都曾经历过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赶超的经济国际化阶段,世界财富和文明正是在这一接力力和传递的过程中获得了积累。战后,欧美经济步入稳定的增长路径,飞速发展的日本及以韩国为代表的亚洲四小龙等新兴经济体相继成为经济国际化舞台上的明星,二十世纪是他们经济国际化的世纪。中国则在前者经济国际化的溢出效应中获得长足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为自己真正的腾飞提供了必要的准备。新世纪初,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开始减速,中国的热度令世界瞩目。据高盛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15年超过日本,2039年则超过美国。2006年,中国稳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排名第二,中国日益突出其世界经济的重要性,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在不断地变化,同时,经济增长也需要经济国际化为其开拓空间,中国的经济国际化必然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变量。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中国的钢、水泥、化肥、布产量居世界第一,发电量为世界第二。只要能够保持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年均增长4%至5%,到2015至2018年,中国的工业化将基本实现。随着工业化步伐加快,中国城市化水平也不断提高。2006年全国城市化水平达到43.9%,除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外,又有8个城市群崛起,城市群成为发展龙头。进入本世纪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

就是由工业化和城镇化这两个因素推动的。迄今为止,二者仍未有见顶的迹象,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际资源市场的波动性,使得仅仅依靠进口和在国内配置资源受到了巨大的约束,中国越来越缺乏的是土地、能源和矿产等自然资源。

例如,在农业部门,土地等资源与劳动力数量严重不匹配。我国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耕地面积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3%,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4公顷,仅相当于印度56%、美国的14%和加拿大的5%。人口的增长和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有进一步加剧耕地减少的趋势,农业用水形势也日趋严峻。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牢牢掌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始终是我国农业发展战略的基本立足点。在扩大农产品有效进口,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技术以促进粮食增产的同时,充分利用境外土地、水源、水产等自然资源,建立稳定、可靠的境外农产品供应基地,已成为农业“走出去”的必然选择。

例如,在工业部门,一方面,重工业面临严重的原材料缺口,另一方面,传统制造业出现了产能过剩的局面,家电行业如洗衣机、电冰箱和微波炉产能过剩率30%-40%。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和最大的铜消费国。本世纪前20年将是矿产资源消耗的高峰期,大宗矿产品的消费弹性系数都将大于1,即矿产品消费增长要快于GDP的增长。中国人均矿产资源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58%,到2020年,国民经济建设需要的大宗矿产,如石油、铁、铜、铝、钾等均不能满足需求。其中,铜需求量缺口357万吨,铝需求量缺口1055万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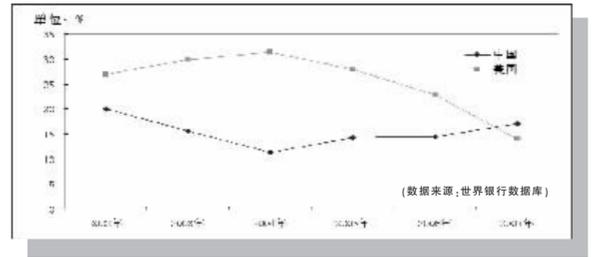
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空间,这和亚洲其他的国家经济发展有共同的规律性,拓展新的发展空间,需要经济国际化为其开辟道路。同时,巨额外汇储备为中国的经济国际化提供了资本。中国过剩的劳动力、过剩的制造业产能与内需不足的矛盾都需要开辟海外市场寻出路,而一些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引进中国的资本、技术和管理来发展本国的经济,使本国的资源得以有效利用,合理配置。

中国经济国际化程度的变动

	进出口/GDP	贸易额占世界比重	FDI流入/资本形成总额	FDI流出/资本形成总额	FDI流出/FDI流入(存量)	人均GDP(美元)
1980年	19.00	1.00	0.60	0.00	0.00	309.00
1990年	32.30	1.30	2.50	0.59	21.53	344.00
1995年	40.00	2.80	13.30	0.66	17.58	604.00
2000年	49.10	3.30	9.70	0.69	14.36	949.00
2006年	73.50	6.50	5.30	1.53	30.46	2018.0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UNCT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7;世界经济年鉴2006、中国经济年鉴2006

2002-2007年中国和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国际金融危机加速推动中国经济国际化进程

首先,全球金融危机加剧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动。2008年夏季以来,肇源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蒙上了阴影。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的蔓延,暴露了世界经济运行存在的问题。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成果是卓著的,对经济国际化的诟病只能因噎废食。虽然,金融危机带来了世界经济的剧烈震荡,但在新一轮经济周期中,中国引领增长的格局并未改变,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地位是稳定的。

2009年,美国经济将面临1.6%的负增长,欧元区为-2%,日本更甚,达到-2.6%。中国提出2009年保GDP增长8%的宏观经济目标,更加凸显了世界经济增长对中国的依赖。

本世纪以来,美国和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一直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2004年之后,更是中国一路提升,美国连续下降(见图)。近期联合国发布的《2009年世界经济报告》显示:2009年世界经济增幅可能仅为1%,而中国经济增长率将达到7.8%-8.9%,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将从2008

年的22%增至2009年的50%。

其次,金融危机加速了中国的经济国际化。金融危机导致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经济、金融指标急剧恶化。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为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重新整合提供了机会。一方面,发达国家资产价格缩水,不少企业陷入困境,急需资本救助,另一方面,一些国家资金充足,缺乏资源与核心技术,过剩产能需要淘汰转移,同时,还有很多的欠发达国家需要资金、技术和管理。各取所需必将带来全球性的大规模并购与重组。拥有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为中国借机加大对外投资获取资源与核心技术提供了条件,同时,通过转移过剩的产能也将加快中国资金、技术、管理的输出。

2009年3月,吉利闪电收购DSI变速器公司,成为全球金融危机下海外抄底的一个成功案例,国内企业抓住机遇,纷纷“抄底”海外技术研发中心。重庆等地区由政府牵头斥巨资到海外收购土地、铁矿石、机械设备等重要资源。中国企业境外投资主体越来越多元化,行业跨度也在加大,50%

都属于跨国并购,为此,2009年4月,商务部特别出台了《境外投资管理办法》,把核准权限大部分下放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新办法为企业赴海外投资提供了更大的便利,投资境外审批加速,将会激励更多的企业走出去。

再次,我国对外输出资本、技术和管理,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欢迎,因为我国经济的国际化道路是一个多赢的新模式。当前,我国与拉美、非洲、西亚等地区的经济往来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而且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工业体系尚不完善,制造业产值构成与我国有很强的互补性,例如,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这5个南美国家优先发展自然资源加工工业,重点产品诸如植物油、纸浆、纸、铁、铜等以矿业原料为基础的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纺织等轻工业和电子产业则相对薄弱,可以通过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现地生产,输出我们的资金、管理和技术。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只有顺应潮流,认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走好经济国际化的道路,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才能突破资源和市场有限性

的约束,进入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经济崛起才能够真正实现。如何走好经济国际化的每一步,走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国际化道路,对于中华民族的精英来讲则是一次大考。

我国经济的国际化,是在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环境中迅猛发展的,势必要走出自己的独特的经济国际化道路。

中国的经济国际化与日本、韩国等经济国际化相比,所处的环境有较大的差别。日本在产业变迁、迅速经济国际化的时期,其历史环境非常优越。虽然遭遇了两次石油危机,但都很短暂,总体而言,能源、原材料充裕,价格低廉,同时有中国等发展中大国成为他们广阔的市场。中国的经济国际化所处的环境从经济增长的资源约束和市场约束这两个条件来看,与日韩的经济国际化不可同日而语。在能源、原材料价格高昂、供给不充裕的国际环境中推进经济国际化进程,必须要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新节能型经济国际化。

中国从被经济国际化的弱势地位到今天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

特色的经济国际化必然是互惠互利、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共赢,体现中国和谐文化的经济国际化。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登上世界经济历史的舞台,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一定不会仅仅从本国的利益出发,制定有利于中国发展而损害别国长远发展的规则。相反,在国际经济事务中,一定会以共赢为指导思想,积极推进国际经济秩序向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在走出中国特色经济国际化道路的过程中,政府作为战略和政策的制定者,其对经济国际化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是至关重要的。企业不仅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经济国际化的载体,如何发挥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创新节能型经济国际化、有效规避风险的经济国际化,构建和谐共赢的开放格局,这些职责都需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来承担。能否深刻理解并深入研究经济国际化的新趋势,为政策制定和企业行动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则是对我国学术界的考验。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今日看板

中国城镇化之路 需要调整方向打开新局

◎亚夫

在过去的30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较快增长,很重要一点与一线城市的规模建设有关。但随着大量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不断向特大城市聚集,一方面城乡间、区域间、社会阶层间结构失衡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是一些特大城市“城市病”也越来越明显。

可以说,中国的城市化之路走到今天,已经来到了需要调整方向的关口。尽管在下一轮发展中,城镇化仍将是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引擎,但如果不对未来的城镇化之路在内容和空间上有所调整,在理念上有所更新,那么,难免会造成决策失误、投资失败,造成新的环境与社会问题。

先来看一组数据,1979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之比为18.96%,到1996年首次超过30%,达30.48%,而2007年城镇人口占比为44.94%。再按地区细分,2007年城镇人口占比上海88.70、北京84.50、天津76.31、广东63.14;另外,贵州28.24、西藏28.30;而占比在30-40的有甘肃、云南、河南、四川、广西、安徽、江西、新疆等。

讲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根据国际上流行的以城镇人口占比来衡量城市化发展的阶段,当城镇人口低于30%时为初期阶段,在30%-70%为中期阶段,70%以上为后期阶段。据此判断,中国在1996年已进入城市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到2007年已升至第二阶段的加速期。与此同时,上海、北京等地已进入城市化后期,而另10个省区则在第二阶段附近徘徊。

依据国际经验,城市化发展与经济转型关系密切。在初期阶段,往往是农业占主导地位,工业化步伐才刚刚开始;在中期阶段,工业化加快,大量农村人口转向城市,城市规模迅速扩大,百万以上人口城市快速增加;在后期阶段,“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城市产业面临结构性变革,城市化步伐放慢,并进入下降通道。

从中国的角度看,目前整体城市化率已达到44.94%,已进入加速发展期。但进一步细分,则可以发现,一方面,像上海、北京这一类城市,其自然承载力和社会承载力都出现了不可持续的征兆。比如,上海和北京都有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而生活成本商务成本大幅上升,不仅出现了规模不经济现象,还诱发了职场白领的心理问题。据悉,中国目前有1.73亿人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碍,就和“城市病”有关。

另一方面,一些刚刚崛起的省区,一些正在城市化的城镇,则需要有更多投入。比如,仅从污水处理这一指标看,据有关人士最近一次讲话,目前中国有141个中小城市还没有投入污水处理运行,750个县城没有建设污水处理厂,17000多个建制镇污水处理基本还是空白。也就是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还有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要做。而这一切,都需要人们把眼光从已开发城市,转向更有上升空间的开发中城市。

鉴于各地区差异巨大,发展极不平衡,在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发挥好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当前,尤其要把重点放在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上。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提高城市规划水平,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管理,全方位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

从以上表述中可以发现,有关方面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已经有所警觉,并对未来的城镇化发展,在空间布局与重点把握上有全新思考。尤其是把农村人口的转移与中小城镇建设联结在一起,这既是对人口有序流动和有效布局的全新尝试,又是为中小城市建设提供充沛人力和大量消费者的全新探索,同时也为特大城市持续增长的外来人口压力找到了缓解办法,是一项很有谋略的高招。

根据这样的空间布局和思路来考虑未来的投资策略,投资界要把重点放在哪里应该会比较清楚了。只是在这里,有两个概念恐怕是很多人都不大明白的,这就是“城市化”与“城镇化”到底是不是一回事。这两者之间,虽有一字之差,但重点何在,则完全是两回事,有待进一步澄清。

本版编辑:邹民生 朱兆奎